

# 中缅关系的转折：1954年

))) 以外交部解密档案为视角\*

范宏伟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厦门 361005)

[关键词] 中国; 缅甸; 中缅关系

[摘要] 1954年, 中缅两国总理互访, 不仅确立了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而且双方围绕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沟通, 增进了了解, 减少了疑虑。1954年的双边往来开启了两国高层直接接触、交流的大门, 打破了建交初期双边关系冷淡的局面, 两国关系取得突破性的发展。此后, 中缅关系迅速发展, 迎来了 / 胞波0 友好时期。这种状况主要是由于 1954年中国结束 /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0 的外交方针, 在周边推行睦邻友好外交, 而中国政策的这一转变也得到了缅甸的积极回应。

[中图分类号] D822.1.3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6099 (2008) 05- 0090- 05

## The Shift of Sino-Burma Relations in 1954:

Perspective from the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f China'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Fan Hongwei

(Centre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Keywords: China, Burma, Sino-Burma Relations

Abstract: The two premiers of China and Burma exchanged their visits in 1954, thus not only opening the door of high level contact and dialogu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but also warming up their once cold bilateral relations. During their exchange visits, the two countries established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as the basic guiding principles for Sino-Burma relations, and discussed matters of interest and worry to both sides. Since then, Sino-Burm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ies entered a period of blossom. The shift of China-Burma relations can be attributable to the following changes: China stopped adopting the foreign policy of / cleaning the house to invite new guests0 and developed the good-neighborly and friendly relationship with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while Burma actively responded to the change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缅甸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 但建交初期 (1950-1953年), 两国关系较为冷淡。这种状况随着 1954年两国总理的互访而发生变化, 中缅关系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此后, 两国来往密切, 进入了冷战期间中缅邦交最为友好的时期。对于冷战初期中缅关系的这种变化和发展的意义, 邱吉尔曾评价说, / 包围中国, 缅甸是一个缺口。0<sup>[1]</sup>还有学者说, / 缅甸是中国唯一可以来去自由, 以及非洲、拉美和亚洲其他国家代表团通过缅甸自由往返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0<sup>[2]</sup>目前, 学术界虽然注意到 1954年中缅关系的变化, 但迄今还没有人对这种变化的过程、原因和影响等进行深入的研究。

## 一 1954年的中缅政治关系

缅甸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 但这一良好开端并没有使双边关系在建交 (1950年 6月 8日) 后迅速发展。相反, 建交初期的两国关系 / 是不明朗的, 是颇为冷淡的。0<sup>[3]</sup> 中国认为缅甸不是真正独立的国家, 是帝国主义的走卒; 缅甸则担心中国威胁其民族独立和国家安全, 对新中国充满了恐惧和猜疑。1954年, 以两国总理首次互访为标志, 中缅关系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对于 1954年在 中缅关系史上的重要意义, 缅甸总理吴努曾多次表示,

\* [收稿日期] 2008- 03- 31

[作者简介] 范宏伟,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暨南洋研究院副教授、美国乔治敦大学外交学院博士后。

自从 1954 年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以来，中缅关系起了新的变化，遵循着五项原则，两国友好和经济及文化交流有了发展。<sup>0[4]</sup> / 当中国在 1949 年成立时，我们两国的关系不能说是融洽的。由于中国总理访问缅甸和我到中国的访问，中缅两国的了解增进了。在这新的了解的基础上，我们两国发表了联合声明支持著名的五项原则。我们签订了经济和贸易协定，并且互派了文化代表团。<sup>0[5]</sup>

1954 年之所以成为中缅关系的转折点，是由于两国总理互访，打破了建交初期两国关系冷淡的局面，双方通过交流磋商消除了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障碍，并共倡 / 和平共处 0 五项原则，将其作为 / 指导中国和缅甸之间关系的原则<sup>0[6]</sup>，由此确定了两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框架和大方向。对于 1954 年 6 月周恩来的访缅及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吴努评价说，周恩来的 / 访问和我们共同发表的声明大大地有助于取得中缅两国更好的谅解<sup>0[7]</sup>， / 虽然在起初，我们对中国的意图也许还有疑虑<sup>0</sup>，但是由于周总理的访问和五项原则的宣布， / 已使这些不安消除了<sup>0[8]</sup>。周恩来对此也表示肯定， / 社会制度不同而又紧邻的两个新的国家，在初接触时，彼此存在着若干疑惧，互不了解，这是很自然的<sup>0</sup>，但是， / 两国总理的相互访问和五项原则的确立，已经使这种疑惧和不了解逐渐消除。<sup>0[9]</sup> 指导两国关系的 / 和平共处 0 五项原则的确立固然是 1954 年中缅关系突破的重要标志和原因，但双方领导人在北京和仰光围绕实行五项原则的具体问题和影响两国关系问题上的沟通，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达成的共识，才是 1954 年成为中缅邦交转折点的关键所在。

首先，两国领导人的接触，增进了了解，增加了双方进一步来往的信心。两国执政党中共和缅甸自由同盟均是首次掌握政权，缺乏外交经验，彼此都有相当的成见。在 1954 年两国总理互访以前，中共认为缅甸总统苏瑞泰是 / 一个封建大领主<sup>0</sup>，总理吴努是 / 一个穷凶极恶、臭名昭著的大缅甸奸<sup>0[10]</sup>。缅甸害怕中国领导人是希特勒式的人<sup>[11]</sup>，担心周恩来是一个骄傲、暴躁、难对付的人<sup>[12]</sup>。1954 年的互访虽然时间不长，但两国总理在对方国家的所见所闻以及围绕彼此担心的问题进行的交流，对于消除由于陌生、道听途说而产生的偏见，特别是由于西方对中国的妖魔化宣传而产生的恐惧是非常有效的。吴努曾坦白地表示其来华访问前后的心理变化：刚刚到达中国时， / 曾有某种疑惧<sup>0</sup>，但经过 11 天的访问，我们的疑惧消失了<sup>[13]</sup>。

1954 年 12 月，毛泽东在与来访的吴努会谈时也赞扬缅甸领导人访华的做法，表示中国想同泰国建交，而 / 泰国说怕我们侵略，但是缅甸也怕啊！而缅甸的做法却是搞好同我们的关系，并且来看看我们是不是要侵略缅甸。可是泰国却连看都不愿意来看<sup>0</sup>，并鼓励缅甸： / 你们有话，有怀疑和不满意的地方，就讲出来。<sup>0[14]</sup> 经过与中国领导人的接触和会谈，吴努也承认， / 过去我们是不敢有什么话就讲出来的，怕的是我们被误会是英国、美国的走狗，怕的是反对我们的党正是这样向你们报告的。不过现在我们

互相见面以后，互相进行了讨论和有了了解以后，我们就不再怕有话直说了。这是我这次访问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sup>0[15]</sup> 另外，周恩来总理的个人魅力和卓越的外交风范，也给有恐华心理的缅甸人留下了良好印象，增加了缅甸领导层对中国的好感。例如，在周总理首次访缅之后，缅甸人感觉 / 周总理年轻，风度可爱<sup>0</sup>，尊重缅甸风俗习惯， / 很会外交，是一个政治人物<sup>0[16]</sup>， / 他的举止表明他不是——一个强国的总理，而是一个兄弟国家的总理。周恩来总理的这种态度，使我们在半小时内消除了那些错误的猜想。自那个时刻以后，我们完完全全相信：如果一位总理在对待一个小国时竟然如此谦虚和如此友爱，那末他所统治的国家的人民将会更加慷慨和好客得多。<sup>0[17]</sup> 对于周恩来这次访问的效果，吴努致信周恩来表示， / 我很高兴地说：在您个人方面，在中国总的方面，您在这里都创造了一个大的友谊圈子。<sup>0[18]</sup>

其次，缅甸就中国所担心的问题作出了承诺，减少了中国的疑虑。新中国成立后，朝鲜战争、援越抗法、美国对华采取的遏制政策等，使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日益恶化，与中国有 2000 多公里边界的缅甸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国对缅甸最担心的是，如果缅甸倒向西方，中国西南的安全形势势必大大恶化。1950 年 9 月 13 日，美国与缅甸在仰光签订双边经济合作协定，向缅甸提供经济、技术援助，这引起了中国的警惕和不满。1950 年 12 月 13 日，5 人民日报<sup>6</sup> 发表的一篇社论指出， / 美国已分别与泰国及缅甸缔结军事及经济协定，一方面加强对各国的经济掠夺，一方面又加强其变这些国家为军事侵略基地的活动。<sup>0[19]</sup>

1951 年 10 月，缅甸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主席德钦伦在中国 5 云南日报<sup>6</sup> 上发表文章，指责缅甸政府接受美国援助，允许美国在缅甸修建军事基地。为此，缅方特意向中国做出解释，否认德钦伦的说法<sup>[20]</sup>。

1954 年 12 月，吴努访华时特别提到这个问题，表示缅甸虽然自己没有能力来干涉中国内政，但如果做中国敌人的走卒的话，是有能力给中国制造麻烦的，我们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进攻中国的军事基地，还能为他们在中国进行间谍和破坏活动提供便利<sup>[21]</sup>。但是，吴努代表缅甸政府向中国承诺， / 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决不成为任何国家的走卒<sup>0</sup>， / 决不接受可能使这两国中任何一国感到疑惧的单方面的援助， / 我们也不会在一国指使下采取会引起另一国忧虑的行动方针。<sup>0[22]</sup>

再次，中国对缅甸所担心问题的承诺和态度，减少了其对中国的怀疑和猜忌。周恩来访缅以前，缅甸一直担心中国进行革命输出，颠覆其政权。吴努曾在缅甸国会发言表示，建交后中缅关系一度颇为冷淡，新中国对我国叛乱者的态度虽然不明确， / 但却表示了一定的情谊。当时北京电台的广播可资证明。<sup>0[23]</sup> 1954 年周恩来在仰光访问时表示，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意见，革命是不能输出的，输出必败，各国共产党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成功<sup>[24]</sup>。有学者认为，周恩来在 6 月 27 日发表的 / 革命不能输出<sup>0</sup> 的声明对缅甸人来说有着特殊的含义。从吴努总理 1954 年 12

月 2 日在北京的讲话来看, 周恩来 6 月的访问对缅甸的对华政策的确起了关键的作用<sup>[25]</sup>。不仅如此, 周恩来在此次访缅期间发表的两国联合声明中特别强调: / 各国人民都应该有选择他们的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权利, 不应受到其他国家的干涉。革命是不能输出的, 同时, 一个国家内人民所表现的共同意志也不应容许外来干涉。<sup>0</sup><sup>[26]</sup>

针对缅甸独立后不断动荡的国内局势、各种反政府武装的活动以及外来势力干涉的可能性, 1954 年 12 月, 毛泽东向来访的吴努表示, / 我们希望你们国内和平, 我们只以每个国家的政府为对象来解决问题, / 我们决不会在云南边境组织军队打进缅甸。<sup>0</sup><sup>[27]</sup>

华侨问题是困扰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向吴努承诺, / 我们在华侨中不组织共产党, 已有的支部已经解散, / 我们嘱咐缅甸的华侨不要参加缅甸国内的政治活动, 只可以参加缅甸政府准许的一些活动, 不要干涉缅甸内政, 服从侨居国法律, 不要同反政府武装联系<sup>[28]</sup>。毛泽东在华侨问题上的表态, 在两国发表的会谈公报中得到确认。此外, 公报还提出两国政府将尽快协商解决华侨国籍问题<sup>[29]</sup>。

吴努访华期间, 两国总理认为有必要在两国适当的城市互设总领事馆, 这实际上也是中国减少缅甸疑虑的一个步骤。对此, 毛泽东曾明确解释, / 过去缅甸认为云南省是黑暗的, 不知中国在那里放多少军队, 对缅甸在搞些什么鬼, 缅甸对我们很不放心。因此我们就建议缅甸在云南设立领事馆看守着。<sup>0</sup><sup>[30]</sup>

## 二 1954 年的中缅经济关系

同中缅政治关系相类似, 两国经贸关系也是从 1954 年开始取得突破。1954 年 4 月 22 日, 中国与缅甸在仰光签订了第一个贸易协定 (有效期 3 年)。根据协定, 中国向缅甸出口煤、轻工业品、手工业品等, 缅甸向中国出口大米及米产品、矿产品、木材、橡胶和棉花等商品<sup>[31]</sup>。根据这一协定, 同年 11 月 3 日, 双方又在北京签订了缅甸大米同中国商品换货议定书和中国购买 15 万吨缅甸大米的合同。1954 年 12 月吴努访华时, 经过商谈, 双方认为有必要准备开辟两国航线, 恢复公路交通并缔结邮电协定。为了发展两国间的贸易, 两国总理还同意, 1955) 1957 年, 中国每年从缅甸进口 15- 20 万吨大米; 同期, 缅甸从中国进口中国能供应的工业设备、工业器材和日用必需品<sup>[32]</sup>。

虽然, 1954 年两国签订的贸易协定与合同涉及的数量、金额和种类在两国的对外贸易中均无足轻重, 但它标志着两国改变建交初期相互观望的态势, 开始积极主动地发展双边经贸关系。1954 年中缅经贸关系的突破性发展, 很快在次年的双边贸易额上体现出来。1955 年中国对缅甸贸易额比 1954 年增加了 30 倍, 其中进口增加了 32 倍, 出口增加了 28 倍; 1956 年中国对缅甸贸易额同比增加了 44%, 其中进口增加 3%, 出口增加 109%。

1954 年, 中缅经贸关系取得突破性发展的原因, 既有

政治关系发展带动经贸发展的因素, 也有经济服务政治的成份。在贸易商品上, 中国主要从缅甸进口原材料, 向其出口日用百货、各种机械和设备等。虽然当时两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程度都较低, 但同缅甸相比, 中国仍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中国驻缅使馆曾这样总结双方贸易活动, / 缅甸生产、生活的需要与我国出口可能, 较易结合, 其出口商品与我国进口需要, 则存有矛盾<sup>0</sup><sup>[33]</sup>。1954 年 10 月, 周恩来在接见来访的缅甸代表团时提出, / 今后我们准备满足缅甸在入口方面的需要, 希望缅甸能指出所需要的货品, / 今后两年内, 如果中缅贸易不能平衡, 我们愿意专款付现, 这在我们的对外贸易方面也是特殊的, 因为通常我们是以货易货。<sup>0</sup><sup>[34]</sup>周恩来的这种态度清楚地表明了当时中国利用经贸推动两国关系的目。这一状况最突出地体现在两国的大米贸易上。

大米生产是缅甸经济的基础, 大米占其出口总值的 70% - 80%。对此, 中国驻缅使馆曾表示中国的 / 大米也是大宗出口物资之一, 不可能用外汇大量购买大米, 只能在缅甸迫切向我求售时, 酌予购买, 以示照顾, 助其克服困难。<sup>0</sup><sup>[35]</sup> 1954 年 11 月, 吴努总理致周总理的备忘录中提出, 中国在 1953 年定购的缅米 20 万吨, 对于这些 / 大米是否适于食用, 也不清楚, 请中国派去的大米调查员到仰光对大米 - 进行很彻底的检查。<sup>0</sup><sup>[36]</sup> 这表明, 双方对第一份贸易协定中的大米贸易并没有进行详细、充分的规定, 中方意在通过大米贸易来推动双边关系发展的意图不言而喻。

中国在大米贸易中的善意举动, 的确也赢得了缅甸的赞许, 缅甸总理吴努曾多次公开肯定中国这一举动的重要意义。1954 年, 吴努在仰光举行的缅甸民族节纪念大会上特别提到, 不需要大米的中国为了帮助缅甸而购买缅甸大米<sup>[37]</sup>。/ 中国现在是一个能把粮食卖给外国的国家, 但仍同意购买缅甸大米。这是对缅甸的诚意帮助。<sup>0</sup><sup>[38]</sup>

## 三 1954 年中缅关系转折的原因

1950) 1953 年, 中缅关系较为冷淡是由于受两国外交政策以及双方对彼此的认识的影响所致, 但最为主要的原因是受中国的缅甸政策的制约。1954 年, 两国关系出现重要转变, 主要是由于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 中国对缅政策的转变, 而中国外交政策的这种变化也得到了缅甸的积极回应。

第一, 国际环境因素。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 美国先后与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地区签署双边军事条约, 建立军事基地, 增加驻军和组成军事同盟等, 建构起针对新中国的军事包围圈, 导致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不断恶化。这些条约主要有 5 泰美军事援助协定 6、5 菲美共同防御条约 6、5 韩美共同防御条约 6、5 美台共同防御条约 6、5 美日共同防御援助协定 6、5 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 6 等。美国对中国实行的封锁与遏制政策, 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因此, 突破美国的封锁和包围, 拓展生存发展空间, 争取

和团结亚非国家,特别是改善、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为国内经济建设营造和平的外部环境,成为朝鲜停战之后中国外交的根本目标之一。

第二,中国的缅甸政策。1949年6月,毛泽东曾在5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中国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也反对走第三条道路的幻想<sup>[39]</sup>。所以,有西方学者据此认为,缅甸奉行中立外交政策,在两大阵营之外实行第三条道路,因此,“中国的外交政策与缅甸的对外政策基本上是矛盾的”<sup>[40]</sup>。显然这种观点没有充分注意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共调整对两大阵营理论的认识,对中立主义、“第三条道路”的态度发生的转变。1952年,周恩来提出对“中立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不能采取敌对态度,不要把它们挤到敌人的营垒里去,我们可以和它们做朋友。”对于同中国建交的东南亚民族主义国家,“我们要在战争时争取他们中立,在和平时争取它们同帝国主义保持距离。”<sup>[41]</sup>

1954年,中国新的对外政策内容以反制美国的封锁和包围,为国内经济建设营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为目标。新政策的基点是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其特点是通过在亚洲特别是在周边地区建立“集体和平安全”区域和扩大“和平地区”,争取在中国与西方阵营国家之间形成安全缓冲地带。1954年7月8日,毛泽东对中国外交及有关工作提出11条意见。其中包括,“开始建立东南亚和平区域,建立合作并发展它,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或集体和平公约”;“团结一切愿意和平的力量(包括政府在内),孤立和分化美国”;“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等<sup>[42]</sup>。

1954年8月,周恩来在中央政府第33次会议上,提出坚持和推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相信,在亚洲就有可能建立起更多的和更广大的和平地区,这些地区就不致沦为美国侵略集团制造战争和组织对立的军事集团的温床”,“我中央人民政府将为建立亚洲的集体和平而作不懈的努力”<sup>[43]</sup>。

吴努访华期间,周恩来向其表示,中国愿同缅甸一起,“为贯彻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为建立和扩大和平地区,为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而共同努力。”<sup>[44]</sup>此外,双方在两国会谈公报中还提到,“两国总理对于巩固和扩大和平地区问题,表示密切关切。”<sup>[45]</sup>

第三,缅甸的中国政策。缅甸独立后逐步确立了中立主义外交政策,主张不同任何国家结盟,同所有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在促使缅甸实行中立不结盟外交政策的因素中,中国占有重要地位。一些学者认为,“缅甸的不结盟政策主要是保证缅甸领土不被中国侵略,避免被战争破坏”<sup>[46]</sup>,

“害怕与中国对抗是缅甸实行中立政策的部分原因”<sup>[47]</sup>。

作为非社会主义国家,缅甸之所以在第一时间承认新中国,既是其力图向中国表示友好的强烈信号,又是一种防止中国侵略的未雨绸缪之举。缅甸前总统貌貌博士曾解释说,“当缅甸政府决定首先承认新中国的共产党政权时,这一想法的背后是对侵略的恐惧。”<sup>[48]</sup>而这一时期缅甸国内的形势,更促使其迫切需要同中国建立友好、和平的关系。1948年,缅甸独立后两个月,缅甸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相继而起,而中共曾对缅甸国内的革命斗争力量表示过同情和支持。1950年初,一些国民党部队败退至缅甸东北部地区,以缅甸为据点向云南发起多次进攻和袭击。因此,缅甸担心成为台湾“反攻大陆”的牺牲品,害怕中国以消灭缅甸的国民党部队为由侵略缅甸<sup>[49]</sup>。到1953年时形势更为严峻,缅甸境内的国民党军的势力和威胁越来越大,成为影响缅甸国内外安全的重大隐患。面对不断恶化的局势,吴努总理认为,“如果他不采取有效的行动,中国可能会侵犯缅甸或者他自己被迫下台。”<sup>[50]</sup>由此,吴努认为首先得到中国的理解和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1954年当中国在对外关系中放弃以往单纯以意识形态划线,改变对中立主义国家的看法,寻求建立和扩大和平地区时,立即引起了力图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缅甸的共鸣,双方很快找到了利益点共同。

## 四 结语

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美国遏制政策的不断推行、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恶化以及中国恢复发展经济对和平环境的需求,1954年,中国结束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开始在周边推行睦邻友好外交。同时,中国政策的转变也得到了缅甸的认同和积极回应。因此,从1954年开始,两国关系取得突破性的发展,双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往来频繁,中缅关系迅速发展,迎来了“胞波”友好时期。

1954年作为中缅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并不意味着此后中缅关系就一帆风顺,没有矛盾和冲突。其转折性意义主要体现在,相对于1950—1953年建交初期较为冷淡的两国关系,1954年开启了两国高层直接接触、交流的大门,双方不仅确立了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且双方围绕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增进了了解,减少了疑虑和误解,为此后两国解决或淡化未定边界问题、华侨问题、缅北国民党军问题等奠定了良好基础。

## 注释

[1] 5毛泽东主席接见缅甸副总理吴巴瑞、吴觉迎谈话记录6, 5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6, 档号: 105-00339-01(1)。

[2] William Cl Johnstone, *Bumaps Foreign Policy: A Study in Neutral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l 1991

[3] 5缅甸总理吴努在国会上的讲话(摘要)6, 5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6, 档号: 105-00814-01(1)。

[4] 同[3]。

[5] 5缅甸政界要人吴努言论摘要(一九五五年十月

十三日上午十时半)6, 5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6, 档号: 105- 00446- 04。

[6] 5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6, 5新华月报6 1954年第 7期。

[7] 5缅甸总理吴努就缅报歪曲报道中缅联合声明事致周恩来总理函6, 5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6, 档号: 105- 00037- 01 (1)。

[8] 5吴努总理在欢迎大会上的讲话6, 5新华月报6 1955年第 1期。

[9] 5周恩来总理在临别宴会上的讲话6, 5新华月报6 1955年第 1期。

[10] 5缅甸人民的抗争6, 5人民日报6 1948年 5月 10日。

[11] 5毛泽东文集6 (第六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年, 第 382页。

[12] 5中国和缅甸友好关系史资料汇编6 (第二卷第二分册), 1954年, 第 5页。

[13] 5吴努总理在临别宴会上的讲话6, 5新华月报6 1955年第 1期。

[14] 同 [11], 第 377- 379页。

[15] 同 [11], 第 379页。

[16] 5缅甸政府官员及报刊对周恩来总理访缅的反应6, 5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6, 档号: 105- 00259- 03 (1)。

[17] 5吴努总理在宴会上的讲话6, 5新华月报6, 1955年第 1期。

[18] 同 [7]。

[19] 5评杜鲁门艾德礼会谈公报6, 5人民日报6, 1950年 12月 13日。

[20] 5缅甸驻华使馆一秘否认美国在缅建立军事基地6, 5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6, 档号: 105- 00174- 02 (1)。

[21] 同 [13]。

[22] 同 [13]。

[23] 同 [3]。

[24] 5周恩来年谱 (1949- 1976)6 (上卷),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年, 第 393页。

[25] Ronald Cl Keith The Diplomacy of Zhou Enlai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9, p176l

[26] 同 [6]。

[27] 同 [11], 第 374- 376页。

[28] 同 [11], 第 376- 377页。

[29] 5中缅两国总理会谈公报6, 5人民日报6 1954年 12月 13日。

[30] 同 [1]。

[31] 5我国和缅甸签订三年贸易协定6, 5人民日报6 1954年 4月 23日。

[32] 同 [29]。

[33] 5中国驻缅甸使馆关于十年来中缅经济贸易关系的总结6, 5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6, 档号: 105- 00603- 01。

[34] 5周恩来总理接见缅甸代表团谈话记录6, 5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6, 档号: 105- 00130- 01 (1)。

[35] 同 [33]。

[36] 5缅甸总理吴努就中缅大米贸易问题致周恩来总理函6, 5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6, 档号: 105- 00036- 01 (1)。

[37] 5总理宇汝在民族节大会报告6, (仰光) 5中国日报6 1954年 11月 22日。

[38] 同 [12], 第 31页。

[39] 5毛泽东选集6 (第四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年, 第 1473页。

[40] Harold Cl Hinton, Chinaps Relations with Burma and Vietnam: A Brief Surve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at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58, pl 511

[41] 5周恩来外交文选6,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年, 第 52- 54页。

[4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5毛泽东传 (1949- 1976)6 (上),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 第 562- 563页。

[43]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 51954年日内瓦会议6 (第一集),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年, 第 495页。

[44] 5周恩来总理在招待吴努总理的宴会上的讲话6, 5新华月报6 1955年第 1期。

[45] 同 [29]。

[46] David Wenwei Chang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Neutralism of India, Burma and Indonesi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hl DI, dissertation, 1960, pl 1221

[47] John Seabury / Thomson Burma A Neutral in Chinaps Shadow, Review of Politics Vol 19, No 3 Jun 1957, pl 336l

[48] Maung Maung Burma in the Family of Nations Amsterdam, Djambatan Ltd 1956, pl 1451

[49] Kenneth Ray Young / Nationalist Chinese Troops in Burma Obstacle in Burma's Foreign Relations 1949- 19610, New York University Phl DI, 1970, pl 581

[50] Victor Si Kaufman / Trouble in the Golden Triangle The United States, Taiwan and the 93rd Nationalist Divis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66, Jun, 2001, pl 4471

—责任编辑: 王 宣—